

公共译丛



Res Publica Texts in Classic Liberalism

# 自由与传 统



[英] 埃德蒙·柏克 / 著

*Edmund Burke*

Writings on Politics,  
History, and Culture  
Classic Defini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Conservatism



商 群 印 书 馆

Res Publica 公共译丛

# 自由与传统

——柏克政治论文选

[英] 埃德蒙·柏克 著

蒋 庆 王瑞昌 王天成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由与传统：柏克政治论文选 / (英) 柏克著；蒋庆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ISBN 7-100-03258-X

I. 自… II. ①柏… ②蒋… III. 政治理论—文集 IV. D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6833 号

ZI YÓUYǔ CHUÁNTǒNG

自由与传统

——柏克政治论文选

[英] 埃德蒙·柏克 著

蒋庆 王瑞昌 王天成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258-X/D·282

---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068 1/32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8 000 册

印张 111.8

定价：21.00 元

## 公共译丛总序

纵览古今，人类诸文明创发演进，蜿蜒曲折，穿越时空，而能延续至今，均因它们能在发皇延续的历史进程中，容纳百川，汲取不同文明的要素，将自身汇合成浩荡的巨流。不必讳言，近代西方文明所以后来居上，盖因蕴含在其典章制度、法政架构中的学说义理，有足多者。百年以前，中国思想界的先贤已然认识到，处于列国环伺竞争的现代世界，既不能仅以“船坚炮利”为能事，亦不能依旧空腹高心侈言心性，它意味着学术的重点要移至与“公共”相关的理论的汲取与制度的建构上来。张之洞尝言“西学之中，西政最要”；梁启超亦主“译书以政学为先”。近代以来，有识之士，窃火异域，汲汲以译书为先务，对推动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百年如昨，前贤曾为此殚思竭虑，亟待后人承其遗绪。

此处的“公共”一语，西方源自拉丁语 *Res Publica*，其本义为公共事务，引申为“共和”之义。随着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的复苏与拓展，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由此分化，“公共”的制度重

构已成当务之急。私域是个人合理为己之域，个体自由的理念开放了个人利益寻求和价值偏好的多样性；公共领域则是向天下开放的公共权力之域，亦为政治正义寄身之所。以个人自由为价值内核，以宪政民主为制度中坚，正是所谓“公共”之鹄的所在。职是之故，我们继“公共论丛”之后，又有“公共译丛”的创设，旨在通过有关著作的移译，获取相应的思想资源，意欲致力于打开理论的户牖，让自由的思想八面来风。

暝色四合，二十世纪行将降下自己的帷幕；放眼未来，古老的中国文明将在新的世纪里，祛除旧染，重启新机，汇入人类文明的主流。兹事体大，固然不能不度德量力；积土成山，我们愿为此竭尽绵薄。译丛以“公共”为名，不仅指称丛书的旨趣，同时也意味着，“公共”之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诚望海内外学人，无分彼此，鼎力相助。

他的思想材料绝对不会以得到它们时的老样子呈现出来，它们被熔炼和重铸了。它们受到了一个具有创建性的伟大心灵的锤锻和激发，从而获得了生命和架构。柏克之所以是个人文学者，并不是因为他从书籍中汲取了营养，而是因为他造就了书籍——他把写作的题材转化成了文学。这种不可或缺的文学品质，这种对文笔的信心十足的把握，塑造了他的特性，其所起的作用不亚于他的思想本身。在伟大风格的应用上，他是一位大师。每个句子都深深地浸染着他那不同凡响的想像色彩。文气的律动使你的呼吸停滞，使你的脉搏飞动；作品的光辉和力量使你回肠荡气，耳目一新。

——伍德罗·威尔逊

柏克之所以在政治家中显得如此璀璨夺目，那是在处理政治问题时，他倾注了他的思想和想像。因此，不论你是否赞同他的观点，他都会吸引你、激发你，并给你带来裨益。

——马修·阿诺德

## 英文版导言

与其他学问相比，政治学对人文学者一直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是不无道理的。因为，政治对人类生活和道德秩序来说是根本的，这类论题也是文人们最喜欢议论的。与历史一样，政治思想这一人文学科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社会科学。柯尔律治和雪莱都是热衷于政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康拉德对重大的政治问题的洞见甚至超过了大多数的“政治家”。假如我们不失时机地汲取了他们的指点的话，我们至少有可能免遭由于失策而导致的许多剧烈苦痛。但是，把这些人文学者归为艺术家更恰当些，把柏克与他们相提并论并不妥当，因为他们的拿手好戏仅在于论说政治的方式和风格，而柏克属于柏拉图、卢梭这一类型的人。与他们一样，他还了解许多其他事情，而且了解得非常出色。与道德一样，政治这门学科不只是关起门去学就能学好的，它应是成熟

和智慧的结果。谈及柏克，萨缪尔·约翰逊<sup>①</sup>曾说：“任你挑选一个话题，他都能给你谈得头头是道。”

年轻时，柏克就开始了文字生涯。1756年，他的《为自然社会辩护》和《对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起源的哲学探讨》两本书出版时，他27岁。他最后一部著作《论弑君和平信札》出版于1796年，那时他67岁，距离辞世仅有一年之久。在这40年当中，他写的、说的绝大部分是政治，但也忙里偷闲，写了《戏剧论指津》和《英国史要略》。他的某些观点曾改变过，当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最具摧毁力的政治事件——法国革命——发生后，尤其如此。由于他不曾把他的观点系统地表述在一个专论里，以便人们可以从中清楚地厘定他的各个观点之间的关系，因此，当人们在他的著述之中寻觅他的哲学时，其基本构架自始至终具有的一贯性和恒定性，就十分引人注目。

今天，柏克被称做保守主义者，以大多数人的衡量标准而言，他的确是，但是，他献身政治却是为了改革。他是美洲事业的两大欧洲宣传家之一（另一位是托马斯·潘恩）。为宗教宽容辩护时，他舌若电光，应者莫当。他痛斥非洲的黑奴交易，针对英国当局在印度殖民地的腐败行径和蹩脚管理，他不遗余力地与之战斗。他提出“自然的贵族”来对抗“世袭贵族”，从而对贵族阶层予以打击（如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曾做过的那样）。“你们还以为，”柏克写道，“我试图把权力、权威和荣誉限定于由血

---

<sup>①</sup> 约翰逊 (Samuel Johnson, 1709-1784)，评论家、诗人、散文家，第一部英文词典的编纂者，文学俱乐部 (The Literary Club, 成立于1764年) 的主席。柏克是该俱乐部的成员。——译注



统、名分和称号所圈起的小天地之中，你们错了！阁下。除了美德和智慧，不论是实际的或推定的，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作为当政的资格。”他谴责国王和“国王的朋友们”插手政治，设法使他的经济改革法案得以通过——此法案顶住了乔治三世的执意反对，至今还被称作“很可能是18世纪英格兰所通过的最重要的单独的改革法案”。

柏克也是一位浪漫主义者。在政治上，湖畔诗人中的许多人都是他的信徒。他的浪漫主义对经常显得纤弱、做作的启蒙时期的新古典主义是一种矫治。他的感悟力和经验使他能意识到那些若欲拥有和实现正义就免不了会出现的复杂局面以及决断和操作中的苦衷。对那帮搭起架子准备统治新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外行和空谈家，他怎么能不起疑心呢？

柏克对我们有何等价值，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他。如果我们把他当作我们的政府或针对政府某些倾向的批评者，那么，必须把他当作来自内部的批评者。那些批评民主的人可以是政府最得力的友朋，但是，只有当他们的基本信仰一致的时候，才是如此。因为这样，他们才是依据理想来批评现实，至于理想本身，他们并不反对。想要抑制自由权，却不想使其成为更负责的自由；企图奴役人而不是去解放人——这些人正是政府真正的敌对势力。

柏克对法国革命的认识，对我们理解俄国革命具有如此之大的参考价值，以致这成了我们开发柏克价值的一个最佳范例。他的思想此时都汇聚在一起，得到重新思考和完善丰富，然后继续前进，为正义和自由而战斗。在殊死搏斗之中，他的度量有时不

够宽大；他有时有些浮夸；有些事情他也看得不够清楚。他认为法国革命是财产权的敌人，因为它褫夺了贵族阶层的财产，而且事实上法国革命又把财产送到了那些最心狠手辣地攫取钱财的人的手中。他忽视了革命对那些最富热情、最单纯的年轻人的感召力。在人民的正当权力的问题上，他对自己早期的信条有所修正。令人费解的是，他竟淡化旧制度的劣迹，如今天某些人淡化沙皇政权的丑行那样。<sup>①</sup>但是，他在战斗，在与一个他认为对人类文明有致命伤害的观念战斗。令人惊异的是，他看到的是如此之多、推断得如此之准。不要忘记，他甚至预见到了波拿巴主义：

某一讨人喜欢的将军，他精于安抚兵卒之术，掌有统兵作战之真诀，将会把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自己的身上。大军将会基于人格上的原因服从他的调遣……但是，就在这样的事情将要发生的当儿，那个实际握着兵权的人就成了你们的主子，你们整个共和国的……主子。

看来柏克很善于预测，他能准确预知革命的洪流正流向何处。据说，这种传闻是真的：与柏克决裂之前，潘恩曾认为，他

---

<sup>①</sup> 柏克在《法国革命反思录》中关于玛丽以及认为应给予她骑士般的优容的那段文字是如此过分，致使潘恩有力地将他一军，说：“他怜惜鸟儿漂亮的毛，却不顾它奄奄一息的命。”——英文版编者注

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 1755 - 1793）系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之王后。——译注

能说服柏克，让他站到法国革命事业这一边来，并让他了解革命领导人的秘密决定。有一点是清楚的，潘恩的确曾把杰斐逊的一封信送给柏克看，而当时杰斐逊是美国驻路易十六王朝的大使，对革命领导人的某些计划有所耳闻。但是，不论潘恩得到的特别消息有多少，抓住了革命本质的人却是柏克，并且是早早就抓住了，这一点是没有其他哪个人曾做到的。他的敏锐伤害了他的声誉，他是一个早熟的法国革命反对者，正如其他一些人曾是“早熟的反共者”或“早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那样。

法国大革命的发展，基本没有超出柏克的预测。1789年5月5日，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三个阶层的代表坐在一起。第二天早上，第三阶层的代表单独开会，从而迈出了走向革命的关键一步。同年10月，在柏克的笔下，正在发生的事态已引起了他的警觉。<sup>①</sup>到1790年11月时，柏克在此问题上的思想已经成型，于是就发表了《法国革命反思录》。1794年2月5日，那时恐怖统治已持续达11个月之久，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大会上说：

他们说恐怖主义是专制政府所用的手段。那样一来，我们的政府不就和专制主义一样了吗？是这样的，正如在自由奋斗的勇士手中闪烁着的刺刀与用以武装专制政府的走卒

---

① 起初，法国大革命并不由雅各宾派主导，一如俄国革命之初非由布尔什维克主导一样。在这两场革命中，面对暴政的倒台，许多世人都曾为之欢呼过。但是，对于真正的危险，即革命暴政，人们认识不清，毫无防备。也许法国的米拉波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是明察的。——英文版编者注

孔特·米拉波 (Comte de Mirabeau, 1749~1791)，法国政治家、演说家。在革命中持温和立场，主张君主立宪。1791年当选国民议会主席，不久辞世。——译注

的刺刀并无不不一样……革命政府就是要以自由的暴政来对抗专制。<sup>①</sup>

柏克辞世两年后的 1799 年，波拿巴就任第一执政官。

柏克在 18 世纪的法国革命中所看到的，与纳粹带给 20 世纪的东西，性质颇不相同。奥雷尔·科尔奈称之为“对西方的战争”，一如来自西方传统之外的攻击（即便从技术上看不是如此，至少从理论上正是如此），这些攻击的发源地，一部分在古埃及，一部分在热带丛林。而法国革命，按照柏克的理解，虽然也是对西方的一种攻击，但他的思想基础却是自己文明当中最优秀的东西。只是柏克让这些优秀的东西从历史背景中挣脱出来，并被柏克转化为纯粹的哲学，既傲慢又缺乏根基罢了。俄国革命是可以与法国革命相提并论的，它受着意识形态（ideology）的蒙蔽，像法国革命假借“理性”那样去假借“科学”。俄国宣布革命是致力于自古以来的人类理想，这也是步法国人的后尘。恰如拿破仑的军队仍然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号一样，斯大林的军队也象征性地举着“无阶级的社会”的招牌，革命的标签糊在反革命的坛罐上。

因为柏克是位保守主义者，有时他被误认为是一切革命的敌人，那是不正确的。如果根本无法改良，革命成了不得已的最后一招，那么他并不是革命的敌人。当然，即便如此，他也想了解

---

<sup>①</sup> 在苏维埃论战中，我们能听到多少诸如此类的辩论的回响啊！——英文版编者注

一下将要取代旧制度的新制度是什么样的。“如果暴政发展到了极点，”他写道：“政府的暴戾令人忍无可忍，那么，人们就诉诸自然权利，将其推翻。”但是，只有在革命符合道德法——而不是背离道德法——的情况下，才有理由诉诸革命。职是之故，虽然柏克曾为 1688 年的光荣革命和美洲革命辩护，但是又将它们与法国革命严格地区分开来。前两场革命是建立在它们的传统和理想之上的，第三场革命则试图焚毁一切，以便在灰烬之上从事新的构筑。

法国革命，就其理念而论，乃是启蒙运动的几个重要信念促成的后果。这些信念包括：人本身具有天赋权利；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人自身秉赋的理性足以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由于没有哪个人希望邪恶，所以，只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人们就会依之而行。理性之君被推上王位；历史被认为是偶然性和非理性的王国；通过思想人们可找到真理，通过真理指导行动，人们可以消除数世纪以来的贪婪和祸患造成的后果；而且利用正义的法律，人们可以从头开始，另起炉灶。（这里的某些论点与共产主义不一样，但其品性并无二致。）

柏克的攻击，并非像被经常喧嚷的那样，是以历史来对抗理性。也许，他首先应当是理性的守护者。他所痛恨的是理性主义，是从先验的或设定的前提推导出整个观念体系的做法。柏克并不反对归纳综合，他是一个要求社会原则必须建立在社会经验（包括过去的经验或历史）之上的经验主义者。他甚至认为，总是盯着抽象的方法乃是一种神经质的表现，某种程度上也是“懒汉”用以躲避辛勤地获取经验的计谋，而对现实缺乏耐心就会导

致流血。

在柏克看来，抽象化是疯狂行径的温床。如果某人老是用逻辑范畴进行思考，那么，他最终会遗忘他的人民。柏克说，法国的那帮理论家们对人类（mankind）有着深深的爱，但是对具体的人（men）却很不耐烦，更为糟糕的是，索性把他们忘掉。疯狂者之所以要诉诸枪弹和刺刀，那是因为，他们根据某个原则认为某一阶级的成员应当灭绝。抽象化的做法是把具体的人加以分类，然后就抛弃他们仍是人类的想法。“让我们把贵族消灭掉！”（或“清算资产阶级！”）这样说着，就开了杀戒。“很难想像有什么东西会比地地道道的形而上学家的心肠还要冷硬，与其说它近似于人性的脆弱和激情，还不如说它近似于恶鬼的冷酷更妥贴。”把“形而上学家”读为“理性主义的社会哲学家”，这样，柏克的意思就明朗了。这些人会把整个群体都消灭干净（杀掉一切贵族，或者杀掉一切资产阶级，或者，就此而论，杀掉一切律师，这与种族灭绝相比，有何逊色呢？），或者牺牲当代人，以成就未来的人。后一理论意味着我们这些人不像未来的执政者那样重要。（换句话说，林中一只鸟，胜过手里两只鸟。<sup>①</sup>）这如同不抵抗主义者之所为：他拒绝战斗，因为生命是神圣的。但出于崇高理想，为了拯救某些人，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揆其意思，大概以为，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惟有他自己的生命例外。

狂热地牺牲目前以成全将来，对此，还有一个奇特的柏克式

---

<sup>①</sup> “手里一只鸟，胜过林中两只鸟”，乃一英国谚语，此处作者系逆义套用。——译注

的反驳：今天是明天的过去。明天会是什么样，主要取决于今天是什么样。民族传统，某种程度上说总是令人难堪的传统。今天的所作所为，若欲将其后果清除干净，那是很难的。理性主义的危险之处在于：它让人带着被认为是先验的既定原则去面对经验，而这些原则根本不是以往经验的结果。尽管柏克全心全意信奉自然法，但柏克明白，它的原则只能是一般性的指南，后果和前提都与道德抉择紧紧地关联着。“在一切道德抉择系统中，”柏克说，“合乎道德的结果就是它的检验尺度。”对行为的后果予以足够的关注，这在私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在政治生活中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这既能防范疯狂激情的可怖肆虐，也能克服刻板可笑的教条。

柏克对历史的关注恰恰是以他对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理解为基础的。他想让理论以实践为基础，让实践以理论为指导。但是，指导实践的理论，其自身必须是已经过实践检验了的理论。检验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背景是，也只能是，历史。我们的制度是某种自然选择的结果，它们是一些继续实施着的制度。如果它们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出现了故障，那需要对其加以改革。惟有当它们在某些新情况下完全瘫痪，或产生邪恶的时候，才可以将其换掉。因为彻底的革新是一种投机生意，是性命攸关的事。在筹划、改革制度的过程中，在革新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了如何选择的问题，我们必须从对历史的反思中寻求指导。因为，那正是汲取人类经验教训的正确途径。法国的理性主义压根儿不这样做，因为它否认历史之中寓有理性，仅在头脑中寻求理性。柏克对历史的维护很容易遭到误解。理性主义者们维护理性，摒弃历史。

与此不同，柏克维护历史，却并不摒弃理性。他是为理性而利用历史，而非为历史而历史。他说：“上帝禁止我们企图通过步趋旧习来获得智慧。”

理性主义者强调抽象理性，不难想见，柏克在这里发现了现代世界急剧蔓延的人格分裂现象的起因。如果理性与情感和本能是联结着的，是被感性推动着的，是由历史文明滋养着的，那么他就信任它。他不信任没有情感和道德的理性，一如他对脱离经验的理性存有戒心。说实在的，要是他不得不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的话，他宁要单纯的习俗和“偏见”，而不要单纯的抽象理性。因为礼俗乃“国家的恒久的智慧”，抽象理性不大可能比它强。真正的理性是与情感和经验联合在一起的，它尊重现存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它是谦恭的，因为，它试图尽一切可能更多地理解道德秩序（对柏克来说，道德秩序就是神圣秩序的一部分），同时也能意识到它所了解到的是何等的微不足道。理性之所以是谦恭的，还因为它认识到，要是它对实情视而不见，最大的抽象之善会立即变成邪恶。

抽象理性、理性主义，几乎类似于漫无边际的想像。它不像情感那样，根植于具体的事物，并受着我们对其产生的反应的节制。由于傲慢，理性拒斥世人的情感，认为那是幼稚的、不足挂齿的，总是不顾风险把不寻常的或陌生的情感加以理性化。人不单是理性动物，理性，若不与情感联袂，不被道德收束，就有可能沦为强猛而狂戾的激情的俘虏。支配我们行为的总是不可抑制的权力欲，对荣耀的垂涎，以及隐伏的自私意念，与此同时，我们却利用抽象的权利和抽象的善对其加以神圣的解释。



实际上，如法国人所宣布的那样的抽象人权，在柏克听来是可疑的。他们宣称的自由“就是，仅仅是，摆脱某些制约——美德施加给激情的那些制约”。作为回应，柏克提出了“社会自由”——自由由于对社会中每个人的平等制约得以保障，制约既来自社会，也来自个人的自律。至此，我们触及到了柏克的人学的核心。人这种被造物，之所以从其原始状态，即自然状态，步入社会和国家，并不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比较便利，相反，因为人的本性只能在世俗社会中才可能得以完善。脱离社会，人就无法作为一个充分成熟的存在物存在下去。

市民社会……就是一种自然状态，比起粗野而散漫无纪的生活方式来，它更是如此。因为人在本性上是通情达理的，不过他绝不会完全地处在自然的状态中，只有当他被置入那种理性在其中可以得到最佳培育并占据最大优势的环境中时，他才可能是如此。文化是人类的本性。至少，无论在成型的壮年期还是在稚嫩可怜的婴儿期，人们同样是处于自然状态之中。

与往常一样，柏克的思想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尽管不无托马斯主义的成份掺和其间。他的言论散发着托马斯这一格言的气息：“上帝不消灭天性，而是完善它。”

俄国革命不曾诉诸抽象理性，这是与法国革命不同的地方。它的指南针是“历史”——被贴着“科学”标签并带着明显的先验印记的原则解释过的历史。然而，在本质上，它们的结果是一